

项英与上海工人运动

马 军

项英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在他的革命生涯中,前半段主要是从事工人运动(1920—1930年),其间又大都在武汉和上海两地。本文所论述的,是他多次指导上海工人运动的经历。

一、从建立沪西工友俱乐部到五卅运动

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失败后,全国工运形势从高潮转入低潮。上海工人的罢工高潮则早于此,在1922年11月即行退潮,随后转入消沉。当时中共上海地委认识到,出现这种状况,是由于工运工作“没有钻到里面去只立在工人群众外面的,所以做几次,失败几次”。^①直至1924年春,全市亦仅有工人党员8名,^②实难开展活动。这种情况显然与上海作为一个拥有数十万产业工人的大城市身份极不相称的。为此,1924年5月中共中央第一次扩大会议决定:从别处调派有丰富斗争经验的项英、李立三、邓中夏等干部到上海推动工运。

接受任务后,项英很快从武汉来到上海。他吸取了以往上海工运的经验教训,把产业工人最集中的沪西区作为工作重点,并亲自深入到日商同兴纱厂工房内开展工作。他经常和工人们促膝谈心,向他们问贫问苦,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揭露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帮助他们提高觉悟。项英也是纱厂工人出身,他那平实的语言、浅显的道理常常能引起工人人们的共鸣。“他的话都能和工人的思想相接触的,因而他讲的种种痛苦都是工人亲身经历过的,如工钱少、时间长、受打挨骂、无故开除等等”。^③由于彼此间谈得很投机,项英和

工人很快就熟悉起来。不久,他结识了姜维新、王瑞安等几个工人积极分子,并经常和他们保持联系。在项英的鼓励下,姜、王等人以结拜兄弟的形式,把一批工人团结在周围,组织了工会,原来厂里一些工贼和流氓拼凑的工会很快失去群众的信任。这段时间,项英还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所办的沪西工人补习学校中担任教师,亲自对听课工人进行较为系统的文化和阶级教育。讲课之间,他常常满怀激情地介绍十月革命后苏联劳工当家作主以及“二七”大罢工中工人英勇斗争的情况,给工人们以很大的鼓舞。

1924年夏,项英和李立三、邓中夏研究决定,在沪西工人补习学校的基础上,成立沪西工友俱乐部,以加强党对产业工人的影响,进一步团结和组织工人,准备斗争。在武汉曾组建过著名的江岸工人俱乐部的项英,义不容辞地担负起筹建之责。经他布置,嵇直、孙良惠、徐玮、刘贯之等分头进行准备,项英自己则亲自在工人中宣传建立俱乐部的好处,鼓励工人踊跃参加。他告诉工人“应该组织一个俱乐部,便于工人读书,交换知识,联络感情,提高文化,使工人认识剥削,认识压迫。”^④8月间,项英等在小沙渡路(今西康路)

① 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二一——一九二五)》第258页、256页,中央档案馆编。

③ 《王瑞安谈话记录》第3、4页。

④ 《王瑞安谈话记录》第4页。

槟榔路(今安远路)拐角上租得新建平房三间,二间准备做教室,一间做文娱室,门前的空地作为活动场地。项英还以教员的名义向社会募钱,用它买了一些必需的桌凳和文娱用具。一切就序后,在9月1日举行俱乐部成立大会,与会的有30多人,制定了草章,项英当选为俱乐部委员会主任。当选委员的有刘华、顾秀、李瑞清、刘贯之等。项英在会上作了讲演并当即写下“联络感情,交换知识,互相扶助,共谋幸福”16个大字,张贴在中堂上,作为俱乐部公认的宗旨。沪西工友俱乐部成立后,积极采用多种形式在工人中开展活动,其基本方针是通过宣传来组织工人。俱乐部最初只开办识字班和补习班,通过学文化的方式对工人进行阶级教育。项英和邓中夏、刘华、蔡和森、恽代英、杨之华等经常到俱乐部教书、演讲,利用各种机会向工人们深入浅出地宣传革命真理。由于工人入学一律不收学费,再加教员通俗生动的讲解,后来慕名前来听课的工人越来越多。尽管按一小时一班分成几个班,教员忙得应接不暇,但仍不能满足需求。面对工友们求知的急切心理,项英决定改变宣传方法,一方面继续识字班和补习班的工作,另一方面开办讲演会、游艺会。讲演会可以在露天举行,容纳的人多,因而效果也比识字班大得多。由于宣传工作做得出色,组织工作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至1924年底,有19个纱厂建立了俱乐部的秘密组织,会员近两千人。^①在俱乐部内,项英还直接负责工人骨干的培养工作。他经常分批分组地集合骨干分子谈话、开会,耐心教育,努力提高他们的理论水平和活动能力,有些人后来被发展成为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这样,一支坚强的工人阶级的骨干队伍便在沪西迅速形成,其中顾正红、陶静轩、孔燕南、郭尘侠、李振西、韩阿四、王有福等后来都成为上海工人运动的中坚分子。

1925年1月,项英在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再次当选为中

央执委。“四大”的决议明确指出:工人阶级必须积极参加民族革命运动,并且要在其中取得领导地位。根据这一精神,项英和刘华等认真研究了俱乐部下一步的工作方向。2月2日,日商内外棉八厂日籍领班无故毒打一名女工,日本资本家还蛮横地开除了50名阻止行凶的男工,全厂工人因此群情激愤。项英获悉后,立即与俱乐部其他领导人商讨对付办法,一致认为应发动罢工予以反击。由于罢工前的一切宣传和组织工作,都是以沪西工友俱乐部的名义出面的,所以项英当时非常繁忙,夜以继日地投入工作。“他冒着风雪和同志们四处寻找罢工工人集会的合适场合;他深入到工厂工人中进行宣传鼓动和周密布置罢工;他反复和工人骨干一起商讨向日本资本家提出的各项条件;他深思熟虑地和同志们一起着手成立工会的准备工作。……把全部身心都扑上去了。”^②2月9日下午,沪西各纱厂1万多名工人按预定计划实现总同盟罢工,他们高呼“不准东洋老板打人!”“不准东洋老板无故开除工人!”等口号,奔赴潭子湾沪西工友俱乐部门前的空地集会。项英与邓中夏、李立三等人也亲临第一线指挥斗争。项英在会上发表了高亢激奋的讲话,他代表俱乐部对日商纱厂工友的不幸遭遇表示深切的同情,声明将全力支持罢工,直至最后胜利。话毕,全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和吹呼声。随着罢工态势进一步扩大,到2月18日,已有22家日商纱厂、3.5万名工人参加罢工。在项英、刘华为首的罢工委员会的有力领导下,工人们团结一致不屈不挠地进行斗争,终于迫使日商在3月1日宣布接受工人的主要条件。在罢工胜利后的第三天,沪西工友俱乐部和内外棉纱厂工会联席会议一致推举项英负责筹建上海纱厂总工会,并负实际领导责任。

^① 刘贯之:《关于1924—1925年上海工人运动的回忆》

^② 蒋自强,许维之:《项英同志与上海二月罢工》,《上海文史资料选辑》1981年第一辑。

二月罢工的胜利,大大提高了党在上海工人中的威信,并为尔后的五卅运动作了组织上的准备。

1925年5月1日至7日,项英与孙良惠、刘贯之、张佐臣等作为上海纱厂工人的代表,参加了在广州举行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5月中旬回沪,随即参与五卅运动的领导工作。5月24日,内外棉纱厂工会在潭子湾举行追悼顾正红烈士的公祭大会。项英与恽代英、向警予、杨之华等人到场发表演说,鼓励工人罢工雪耻,为烈士报仇。5月31日,上海总工会成立。不久,项英接替刘华出任总工会下属的第四办事处主任。一日,项英获悉:日本资本家曾派人与顾正红家族族长顾雪桥联系,妄图以一万元了结此案。顾雪桥见利忘义,竟答应下来。项英立即派40名纠察队员,把顾雪桥抓来,迫使他写下悔过书,并保证不再搞出卖勾当。^①1925年8月20日,值五卅大罢工的收缩阶段,集36个纱厂工会、12万名会员的上海纱厂总工会正式成立,由项英出任委员长。纱厂总工会是“上总”领导下的人数最多、力量最强的组织。它在项英的直接主持下,步调一致地与各厂资方展开复工谈判和其他一系列斗争,并取得了相当的成果。这一时期,由于项英在工作上足智多谋,因而享有“小诸葛”之称。^②

从筹建沪西工友俱乐部到五卅运动,项英一直置身于基层工人之中,亲身指导上海工人阶级的斗争。此间,他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亦取得了瞩目的成就。1926年9月,项英奉调返回武汉。

二、担任江苏省委书记

大革命失败后,党中央再次派项英到上海,从事党和工会的秘密工作,先后担任上海总工会秘书长、中共江苏省委职工运动委员会秘书和江苏省委常委。此外,他还参与地下刊物《上海工人》的编委工作。1928年2月,

他接替邓中夏出任江苏省委书记,直至同年6月赴苏参加中共“六大”为止。

江苏省委机关常驻上海,统管江苏、上海两地的工作。在上述时间内,中共中央出现了“左”倾盲动主义路线,项英和他领导的江苏省委在对上海工运的指导过程中,“也同样的犯了过分估量现时形势盲动主义的错误”^③,并相应地实行了一系列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策略。例如,1928年3月21日是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一周年的日子。江苏省委在3月13日的通告中规定:自19日至25日一星期为起义纪念周,其中在3月21日“各区各厂工人必须用尽可能的方式做以下的行动:1、在厂内临时关车几分钟,大呼口号和演讲;2、不能关车时,亦须想法鼓励一时的纷扰或单呼口号;3、几分钟的飞行集会、飞行演讲;4、给反动派、工贼、走狗一种行动的恐怖”^④。紧接着,省委又相继提出若干不切实际的目标和偏激口号,如“加紧准备上海第四次暴动!”、“上海暴动是中国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的最后决战”、“上海暴动开始了中国苏维埃形式的革命!”、“上海暴动是全中国工农革命的信号!”^⑤等等。一个月后,江苏省委又颁布了关于纪念“五一”节的指示,其中也同样充满着盲动冒险的情绪。该指示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声称“中国确已到了军阀豪绅地主资产阶级坍台,建立工农兵苏维埃的时代,阶级斗争到了极烈时候。”^⑥指示将4月27日至5月3日辟为纪念周,要求上海各工会届时“尽可能召集群众大会、代表大会或飞行集会”、“应尽力发动群众的红色恐怖,使群众自己动手打工贼走狗拿摩温等”,“可以用各种的武器或斧头、铁条等组织红色恐怖队,

① 参见张维祯:《五卅回忆片断》,刊于《五卅运动六十周年纪念集》。

② 老工人座谈会谈话记录:《五卅运动中上海总工会和有关领导同志的革命活动》第15页。

③ ④⑤⑥《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一九二八年一月—一九二八年八月)》第339、197、198—202页,中央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藏。

执行一切红色恐怖工作”，“应当多量的准备各种壁报、画报、标语、传单等向各工厂各马路发贴”^①等等。此外，还规定了若干过“左”的口号，如“武装暴动夺取政权！”、“拼个你死我活”、“以红色恐怖制止白色恐怖”^②等。由于在敌我力量过于悬殊的情况下，不是组织有秩序的退却，积蓄力量，而是强调进攻，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因而，江苏省委的上述策略，势必在实践中导致严重后果。飞行集会、红色恐怖遭致反动派的残酷镇压，大革命失败后保存下来的工运力量几乎消耗殆尽，许多工会领袖被捕遇害，广大工人情绪低落，赤色工会难以活动……。

盲动主义的作法从一开始就引起多方面的强烈批评和抵制，到1928年初，全国有许多地方实际已停止执行。同年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系统批判了瞿秋白领导的中共中央对中国革命性质、形势等问题的错误估计。5月7日，项英为首的江苏省常委会通过关于接受中国问题决议案的决议，表示认同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的批评，同时对前段时期的盲动也做了自我批评。但是，由于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左”倾盲动主义的严重危害性，不久以后，江苏省委在纪念“五卅”、“六三”时，故态复萌，依旧号召“店员停业，学生罢课，工人停工，举行飞行集会、群众大会、讲演、游行、示威……”。^③其结果自然可想而知。

当然，“‘八七’以来，各地工作的盲动倾向完全是要由中央多负责的”^④。中央对不同意见者是采取宗派主义的打击政策，很严格地威逼各地党部组织暴动。否则，便“立即雷霆风火的停职查办”^⑤。对江苏省委的工作，“中央不深切去了解工作做起来原因，而惟简单的责备是负责同志不好”^⑥，“拼命的指摘下级党部摇动错误，轻意调动处罚”^⑦。在这种形势下，对于项英所犯的错误的，应当说是可以理解的。

三、在上海领导全国工运

中共“六大”在工运方面，对盲动主义的种种错误有所纠正，要求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以组织日常经济斗争为主，加入黄色工会去争取群众。会后，项英由莫斯科返回上海，开始领导全国的工会工作。1929年2月17日至20日，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二次扩大会议在上海秘密召开。项英在会上代表全总作了《过去一年来职工运动发展的形势和目前的总任务》^⑧的报告。报告分析了全国的政治形势、产业状况、工人阶级所受的压迫和痛苦生活，以及工人阶级斗争发展的状况、策略和基本任务等。上海工运作为全国工运的主力军，自然是项英论述的重点。其中，他指出：“自五三惨案以后，上海工人斗争的发展，邮务工人的斗争情绪，更加增高”、“国民党见工人斗争情绪不可制止，欺骗方法已被工人识破，遂改变方法，扬言赞成罢工……表面藉援助名义派代表帮助工作，其实进行破坏罢工工作。”关于黄色工会问题，项英认为“上海黄色工会的发生，是经过相当时期的转变……所谓‘上海八大工会’的联合，这就是最主要的黄色工会的模式”。他正确地批评了轻视黄色工会和将其下属群众全部视为黄色群众、机械地与之对抗的观点，强调应加入其中。但同时，他又片面地坚持建立赤色工会——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实际是不可能存在的，提出要“夺取黄色工会下面群众到赤色工会影响之下”。

① 《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一九二八年一月——一九二八年八月）》第296页，中央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编。

② 中国共产党江苏省执行委员会：《五一劳动节传单》，原件存上海市档案馆。

③ ④⑤⑥⑦《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一九二八年一月——一九二九年8月）》第386、336、337、339、334页。

⑧ 《中国工人》第八期第5—11页，1929年5月15日出版。

1929年6月,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在上海举行。全会通过了项英起草的《职工运动决议案》。^①项英在决议案中指出“上海目前工会运动应坚决的运用公开活动的策略,使工联会的组织成为广大群众总的团体,扩大赤色工会运动”、“今后应当将工作中心转移到产业工人中,特别是工联的群众基础要建立在海员、铁路、五金、市政、邮电、码头、重要产业工人的组织上”、“在上海没有组织的广大纱厂工人,工联应积极将他们组织起来,最好的方式是运用工厂委员会来团结”、“只有在这些黄色工会的工作有基础后,夺取其群众到赤色工会影响和领导之下,才能给黄色工会运动一个重大的打击”等等。显然仍坚持组织赤色工会的错误策略。

1929年11月7日至11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在上海秘密召开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项英当选为全总执委会委员长兼党团书记,并作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作报告》。^②会议期间,项英对革命低潮时期的形势作了过于乐观的估计,夸大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危机,认为反动势力已穷途末路,应建立工人武装“准备武装暴动,积极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在组织形式上,完全拒绝利用合法形式,反对隐藏于黄色工会之下去争取群众,要求普遍建立赤色工会,并由其独立领导斗争。这样,“五次劳大”就正式取消了自中共“六大”以来在工运方面的某些正确规定和做法,从而为工人运动中冒险主义的再次泛滥开了先河。这一时期,中共中央内的“左”倾冒险主义情绪在不断滋长。1930年在上海举行了全总特派员会议,项英在会上作了《阶级斗争,我们的工作以及中心任务》、《黄色工会与工厂委员会问题》、《组织红五月的工作》^③三个长篇报告,系统地部署了以发动全国总起义为中心的冒险计划。可以说,这是以李立三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在工人运动中的集中反映。项英认为“全国的统治阶级,一天便走向崩溃的道路”,

“工人阶级的斗争并不因其压迫而稍缓和,反而更加尖锐起来”,“从北到南,从东到西,没有一个地方不发生剧烈的斗争,没有一地的斗争不是日趋尖锐。”所以,“全国革命高潮之要很快的到来”。而目前任务应是“变军阀战争为革命的武装暴动,武装拥护苏联,积极地准备武装暴动”,其中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同盟罢工和政治罢工”。至于黄色工会,它“到现在已完全法西斯蒂化”,因而“要公开宣传赤色工会的纲领,以使群众充分认识黄色工会与赤色工会的区别,使群众加入赤色工会”、“要坚决的发动反黄色工会的斗争,作坚决的独立领导”。在布置红色五月的工作时,项英当时的“左”的情绪更为明显。他说:“今年的红色五月,更要快的更剧烈的使中国革命走上更高的阶段,要推动阶级斗争到更高的方式,使中国革命走上直接革命的道路”,要在“五一”、“五四”、“五七”、“五九”及“五卅”组织全国性的总罢工、罢课、罢市,特别是“五一”节,“一定要实现广大的罢工和示威”。他还说:“示威是对敌人进攻的,应当公开的去号召”、“示威是巷战冲锋的演习”、“应当采取公开的形式来号召群众去冲锋,不要采取埋伏的形式”、“示威发动时,一定要断绝交通”、“飞行集会一定要有演讲,讲几句也好”、“一定要在示威中应用旗帜”、“要有武器在身等,以准备与敌人作武装冲突”等等。

错误的理论导致错误的实践。特派员会议精神的贯彻,使各地刚刚有所恢复和发展的工运力量再次遭到极大摧残,许多赤色工会的组织被破坏,数以千计的干部和积极分子被捕被杀。以上海为例,1930年6月以后的半年间,由于接二连三地举行了极其冒险

① 见《布尔塞维克》第二卷第九期,1929年8月1日出版。

② 《中国工会历次代表大会文献》第一卷第294—312页,工人出版社1984年3月版。

③ 这三个报告分载《全总通讯月刊》第四期第33—71、91—104、115—130页,1930年6月15日出版。

的游行示威，赤色工会的会员数从 2100 人骤减至 700 余人。^①

1930 年 8 月，项英转返武汉领导工运。同年 9 月，又回沪参加中共六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停止了“立三路线”的执行，项英也受到了教育。同年底，党派项英到江西苏区从事军政工作，从此他离开了工运战线。尽管项英在他工运生涯的后期犯有明显的错误，但是他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能够始终坚持斗争，其表现是英勇的，精神也是可嘉的。

※※※※※※※※※※※※※※※※※※

项英尽管离开了工运战线，但是他与上海工人运动的联系并未就此结束。1938 年 12 月，上海工人救亡协会派人加入“民众慰问团”，辗转到皖南新四军军部慰问。时任新四军政委的项英热情地予以接待，并与上海职工界代表王纪华亲切会面。上海工人向新四

军献了一面锦旗，上书“民族解放的先锋，工农大众的前卫”14 个大字。1939 年 1 月 15 日，项英与军长叶挺联名写信给上海工人救亡协会表示感谢。信中说：“上海工友的斗争精神，向来是有名的”、“我们愿意在江南敌人的后方，坚持游击战争，和各位同志的工作配合起来”、“上海全体工友和我们全体弟兄一定有大会师的一天”。^②。令人遗憾的是，项英最终没能等到这一天。但是，他的名字将永远载入上海工运史册。

(责任编辑：郑庆声)

① 王建初、孙茂生主编：《中国工人运动史》第 170 页，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7 年 9 月版。

② 张祺：《上海工运纪事》第 90 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 1991 年 7 月版。

.....

(上接第 24 页)遗址出土的成批越窑青瓷和长沙窑瓷器及一艘沉船来看，当时以生产外销瓷器为主的长沙窑，其产品主要是在铜官镇码头上船，沿着湘江至岳州，然后过洞庭入长江，抵达扬州，并以扬州为主要中转站，长沙窑瓷器中就有“借问舟轻重，附信到扬州”的诗句。然后再经京杭大运河到杭州，入曹娥江，由曹娥江转入余姚江到明州(宁波)，跟越窑青瓷器一起向东运往新罗(朝鲜)和日本。此外，长沙窑产品从扬州向南入浙江，和越窑产品一起进入广州，装上出海巨舶，向东南航行二百里至屯门山(今九龙西南部)，然后经门毒国(越南芽庄)、马六甲海峡、河陵国(爪哇)、胜邓洲(苏门答腊北部东海岸)、狮子国(斯里兰卡)、婆罗门(印度)、提颡国(巴基斯坦卡拉奇附近)、末罗国(巴士拉)到缚达城(巴格达)。①这条航线把中国与波斯(伊朗)、大食(阿拉伯地区)联结起来。中国、阿拉伯、

波斯的商船络绎不绝地来往于这条航线上；同时，北非、东非的商人也经常出没在波斯湾沿岸各国，特别是阿曼的马斯喀特和苏哈尔两个重要港口。1980 年起在苏哈尔古城堡遗址陆续出土中国的许多瓷器残片，其中就有唐五代越窑青瓷和定窑白瓷。^②可见波斯湾沿岸港口已成为当时亚非各国商业活动的要冲，是中国晚唐五代瓷器销往非洲的必经之路

晚唐五代越窑青瓷、邢窑和定窑白瓷以及长沙窑釉下彩瓷器的外销，拉开了瓷器进入国际贸易市场的序幕，中国瓷器从此源源不断地飘洋过海，深入到世界各国。

(作者单位：苏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责任编辑：吕静)

① 《新唐书》卷 43 下所收贾耽《广州通海夷道》。

② 见前引《中国印度见闻录》。